

地頭達味問你從那裡來答應從依斯拉耶耳兵營逃來達味又問事情如何
 你告訴我他說從戰敗逃跑的多在那裡死的民也來撒烏耳同他的兒子的耶斯
 撒烏耳死了後達味殺敗了亞瑪肋克的人回轉西蛇肋克在那裡住了兩天第
 三天有人從撒烏耳的營盤來他的衣服扯破了頭上撒灰塵到了達味跟前伏

第一篇

衆王經第二卷

对勘研究

《圣经》

早期汉语



1636年
阳玛诺《圣经直解》

1707年
白日昇与徐若翰
的汉语《圣经》

1803年
贺清泰《古新圣经》

本书系一部对早期汉语《圣经》进行对勘研究的专著。本书从汉语《圣经》中最早的两个版本——阳玛诺的《圣经直解》（1636）、白日昇与徐若翰的汉语《圣经》（1707）、贺清泰的《古新圣经》（1803）入手，以对勘的方法将三部手稿四福音书经文与拉丁文《圣经》内容进行字句对照，从翻译、新词等角度，探求每部手稿的翻译策略、词语创新等问题，力求还原早期汉语《圣经》史的发展脉络，并论及其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

王硕丰 著



衆王經第二卷

早期汉语《圣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王硕丰 著

早期汉语《圣经》对勘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汉语《圣经》对勘研究 / 王硕丰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6

ISBN 978 - 7 - 5201 - 0147 - 9

I. ①早… II. ①王… III. ①《圣经》- 汉语- 翻译
- 语言学史- 研究 IV. ①B971②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4306 号

早期汉语《圣经》对勘研究

著 者 / 王硕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卫华

责任编辑 / 孙美子 袁卫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147 - 9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系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之青年基金项目

“早期汉语《圣经》对勘研究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项目编号：16YJC730006）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	001
一 校勘研究概述	001
二 本书研究思路	004
三 研究文献综述	006
1. 阳玛诺《圣经直解》	006
2. “白徐”《圣经》	008
3. 贺清泰《古新圣经》	010
第二章 阳玛诺《圣经直解》	014
一 《圣经》中国翻译史	014
二 阳玛诺研究	017
三 《圣经直解》研究	020
四 研究价值与意义	022
五 《圣经直解》中文版本	023
六 《圣经直解》源本	027
七 《圣经直解》文本	029
1. 《圣经直解》结构	029
2. 《圣经直解》内容	029
3. 《圣经直解》序	030
4. 《圣经直解》索引	031
八 《圣经直解》的翻译	034
1. 西方《圣经》翻译策略史	034
2. 利玛窦翻译策略	038
3. 《圣经直解》与拉丁本《圣经》在章节翻译上的关系	040

4. 例句及分析	044
5. 翻译准确的例句	045
6. 改译	048
7. 增译	050
8. 缺译	051
9. 其他	053
10. 翻译策略分析	054
11. 翻译中的“合儒”色彩	055
九 《圣经直解》的词汇	061
1. 文言虚词	062
2. 文言助词	067
3. 白话虚词	068
4. 意义相近（同）的书面语与口语的比较	069
5. 关于时间的词汇	070
6. 从罗明坚到阳玛诺的神学词汇衍变	071
7. 《圣经直解》神学新词语分析	074
十 结束语	083
 第三章 “白徐”《圣经》研究	085
一 白日昇其人	085
二 徐若翰其人	089
三 合参本的完成	091
四 “白徐”《圣经》成书背景	095
五 “神”之译名	103
六 “圣神”之译名	113
七 “白徐”《圣经》与《圣经直解》	120
 第四章 贺清泰《古新圣经》	130
一 汉语《圣经》研究史	133
二 贺清泰其人	134
三 《古新圣经》内容	137

1. 《古新圣经》藏本	137
2. 《古新圣经》源本——武加大本	142
3. 《古新圣经》结构	142
4. 《古新圣经》注解	142
5. 《古新圣经》序	143
四 耶稣会士来华的历史背景	144
五 《古新圣经》翻译	146
(一) 对勘分析	146
(二) 文化角度	147
(三) 词汇角度	150
(四) 概念角度	152
第五章 《圣经直解》、“白徐”《圣经》、《古新圣经》、拉丁文《圣经》 对勘	172
参考文献	285

第一章 概论

一 校勘研究概述

《圣经》是全世界最广为流行的一本书，它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及研究源远流长。汉语《圣经》在翻译的过程中，无论从文化还是新词角度，都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汉语词汇密切相关。从唐代景教入华起，汉文即已出现有关《圣经》译介的片段、著述，其中不乏翻译者创造、使用的新词语，特别是杂糅佛教词语；明清之际，大批传教士来华，《圣经》的汉译由只言片语的片段式译文过渡到完整的汉译本，在翻译过程中，人们往往采取“以儒释耶”的路线，即拉近天主教义理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以易于中国人接受。这些译本按时间顺序来看，其中最早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有1636年阳玛诺的《圣经直解》（此书翻译了拉丁语《新约·四福音书》26.5%的内容）、1707年白日昇的《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编》（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译成中文）、1803年贺清泰的《古新圣经》（除《雅歌》及部分先知书未译出，翻译了其余的《旧约》及全部《新约》），而这三部作品彼此之间有很强的传承性，甚至有大量段落、语句被直接引用。这些不同版本的汉语《圣经》，在字句的斟酌上，反映了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与儒、释、道的结合；在词语的使用上，除了基督义理方面的新词，生活用语方面也有所创新，部分用语沿用至今。

基督教在我国历史上承载了中西交流桥梁的重要角色，在《圣经》研究日益蓬勃的今天，学者大都将目光投向近代汉语《圣经》的研究，而对于前期稿本的关注极少，比如上述三本极为重要的早期著作，国内外学者鲜有问津。汉语《圣经》的研究方法则多从文学、神学角度入手，极少将其作为译本从比较文学角度入手，而对勘法在当下汉语《圣经》的研究中

更是极为罕见。对勘法研究近年来已逐渐被其他学科学者重视，特别是在古文献的研读方面，如我国佛经研究早就广泛使用对勘法。对勘法在文本的研读中是最基础、扎实的做法之一，只有脚踏实地做好对勘研究，才能真正掌握作者在翻译书写过程中对西方异质文化的引入策略，探讨其对中国文化、语言的影响。

校勘一法，自西汉刘向《别录》起，在我国有悠久历史。到了宋代，校勘学更是独立门户，中央专设校书机构，并制定了校勘条例。近人对校勘颇有建树的应首推陈垣，1931年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初步建立了校勘学的理论体系。纵观我国学术史，历朝历代均有完整的校勘成果流传至今，而偏偏是各类研究方法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个最传统、古老的学术方法，当学者争先恐后运用西方理论和新颖方法研究学问时，回归根本的基础研究似乎被忽视了。自19世纪以来，西方和印度学者发掘和整理梵文佛经抄本的工作持续至今，近一百年来，国际佛教学术界已经出版了不少梵文佛经校勘本，同时也出版了完整的巴利文三藏校勘本，这些校勘本为佛教研究提供了方便。学者依据这些校勘本从事翻译和各种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印度佛教的论著，如果没有这些校勘本，这些学术成果的产生是不可设想的。中国学术界直至20世纪上半叶，才注意国际上利用梵文佛经原典研究佛教的“新潮流”。引进这种“新潮流”，利用梵文佛经原典与佛教相关的中国古代文献进行研究的先驱是陈寅恪、汤用彤、季羨林和吕澂等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澂先生在主持《藏要》的校勘工作时，充分利用当时国外学者整理出版的梵文佛典，诸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经》等，与汉语译本互校，论列其异同是非，于现代学术意义上开梵汉佛经对勘的先河。如今佛经对勘在我国得到重视，在中文佛经解读、梵文佛经解读、佛教汉语、佛经翻译史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较之基督教，佛教之所以在中国的发展、流传更为深远，除宗教本质和历史原因，当下对于经文的重视程度、研究深度及广度，亦是原因之一。

季羨林先生曾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把现存的源本拿来同译文对校，最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翻译史上几个大师像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的译文用这个方法来进行仔细研究。如果打算更深入更具体地吸收古代的翻译经验，那么对勘梵汉经典的工作，无论如何非做不可。如果不做这项工作，

始终好像站在大门外讲大门里的话，说了半天，也难免是捉风捕影。”佛经对勘已历经多年发展，我们应当注意该方法对于研究汉译经文的重要性。佛教或基督教，对于中国人而言皆为外来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经典的汉译必然存在一定的共通性，故研究方法也可相互借鉴。如果我们只是将汉语《圣经》作为一个译作，仅注意它的翻译理论或文学性，也是不够的，在做研究时难免表象化，甚至过于牵强。若要进行源头的、根本性的探求，从根源做起、做最扎实的研究，必须将中文《圣经》与其翻译的源本进行对勘，在基础的字句对照中，方可进行最真实、有效的研究，得出有据可依的结论。

1988年，蒋忠新先生出版了第一部西藏梵文贝叶经的转写本《妙法莲华经》，季羨林先生亲自写下序言：“我们将精选一些海内外的孤本和虽然不是孤本但原文比较有价值的佛典或其他梵文经典，甚至包括一些印度教经典和印度古代自然科学著作，逐步加以编纂、影印、整理、校勘，公之于世，让全世界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和宗教的学者能有机会利用。”20世纪80年代，开展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对勘工作时，季先生认为这项工程“将会大大地促进中印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汉藏两族文化交流的研究，促进印度佛教史的研究”。当下对于汉语神学的梳理，若忽略早期《圣经》的译介工作、不从源头做起，则根本无法理清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不回到根本，就不可能重建中国基督宗教史，因此研究者应该弥补这部分盲点，以扎实的态度回归原点，进行最根本的探索。近四百年来中国如何吸收西学，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关键，是当代中国思想关怀的主要问题所在，而对于西学是如何进入中国历史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具体本文，在一手资料中寻找、整理出西学东渐的脉络，在原始文献中找到历史发展的投影。过去对于汉语《圣经》的研究，基本主要着眼于汉译本本身的解读与诠释，而非站在坚实的语言基础上。从对勘角度，可以对不同语言的《圣经》文本展开有力论证，翻译学的研究也可进入内核，而非停留在语言转换的层次上，从而能够进行最根本的研究。《圣经》研究工作者，可将目光投向这种方法，将佛经研究者的对勘法引荐到汉译《圣经》的研究中，深化《圣经》汉译研究，以新的领域开辟汉语《圣经》研究更广阔的道路，为汉译《圣经》的研究做出更多贡献。

二 本书研究思路

本书将主要着手汉语《圣经》中最早的三个版本：1636年阳玛诺的《圣经直解》（简称阳本）、1707年“白徐”的《圣经》（简称“白徐”本）、1803年贺清泰的《古新圣经》（简称贺本），主要从翻译、文化、新词角度，探求每本著作的翻译策略、词语创新等问题。本书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勘法、译介学以及新词研究等。

本书旨在研究鲜有问津的阳本、“白徐”本、贺本之版本、内容，重点将此三本著作分别与翻译源本——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做经文的逐句对勘，在对勘中分析作者的翻译技巧、策略，从而探求文化、宗教之杂糅现象。以往大量翻译作品的研究多套用西方翻译理论，从结果推原因，千篇一律的路数使得读者难以窥探文本本质，而对勘研究将还原源本与译本关系，在字句对照中向读者展现早期汉语《圣经》译介者的翻译现象。有关上述三部汉译本，学术界目前的研究可以说尚停留在基础阶段，特别是后两者因为存在不同版本，手稿的获取需费大力，使得很多感兴趣的学者望而却步，而笔者有幸在多年考察、留学、访学中，找到了这三部著作现存的全部稿本。这三本著作从任一角度而言都非常值得研究，鉴于前文提到的对勘法之重大意义，笔者突破汉语《圣经》一贯以来的探索角度，加上多年的拉丁语学习，在自认水平尚可的前提下，从对勘研究入手为汉语《圣经》研究效绵薄之力。笔者坚信对勘工作，将为后续汉语《圣经》研究者提供宝贵的基础资料，从而促成未来更全面、深入、广泛的研究。在对勘过程中，笔者将对神学词汇的翻译做专门研究，从外来词角度探讨译者的翻译方式、意图，对基督教神学词汇在中国的翻译、使用、流传、消亡做纵向梳理，在汉籍佛典外来词研究成果颇丰的当下，也为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学外来词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具体来看，对勘法对于研究汉语《圣经》的意义有如下四点。

1. 有助于读解汉译《圣经》。不少读者，尤其是非教徒在阅读汉语《圣经》时，常提出《圣经》语言晦涩、内容难懂。特别是早期的汉语《圣经》版本，如前文所提阳玛诺的《圣经直解》，采取《尚书》谟诰体，语言艰涩难懂，而将其与翻译源本拉丁本《圣经》进行对照后，便一目了然。尤其是将多种版本的《圣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增进对文本的

理解。因此对勘法在阅读《圣经》尤其是早期文言《圣经》时，便于读者理解经文。

2. 梳理汉语《圣经》翻译史。近年来，汉语《圣经》研究者越来越多关注早期版本，如阳玛诺《圣经直解》、“白徐”《圣经》、贺清泰《古新圣经》。现有的史料及书信中并未说明现存最早的这三部汉语经文之间的关系，然而当笔者将三部手稿进行逐句对照后，惊奇地发现：这三部著作在内容上有大量相似甚至完全相同之处，可见译者在翻译中都曾借鉴前人的成果。19世纪，新教二马《圣经》问世。马礼逊曾多次明确说明他借鉴、抄袭了大量的前人成果，经过笔者对勘，发现他所指便是“白徐”《圣经》，而“白徐”又大量引用了阳玛诺本。由此，汉语《圣经》的发展脉络、天主教汉语《圣经》与新教汉语《圣经》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足以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汉语《圣经》发展历程图。

3. 外来词研究。众所周知，佛经中的大量词语已成为汉语词汇中的新词语，并逐渐广泛使用于生活。基督教对汉语新词语的贡献，虽不及佛经数量之大，但也不可忽略。明末，耶稣会士拥有娴熟的汉语水平、高超的翻译技巧，在为数不多有关天主教义理译介的著作中，创造、使用了大量新词，其中不少一直沿用至今。研究汉语神学词汇，不可忽视早期汉语《圣经》著作，必须站在历史的维度进行梳理，才可真正理清词汇的发展脉络。只有在对早期汉语《圣经》各版本进行的对勘，尤其对基督词汇进行梳理，方可窥探这些词语的发展轨迹，讨论基督神学外来词使用上的继承与创造，在对比、整理中发现问题。

4. 翻译语言、翻译策略的研究。若脱离文本谈翻译学，理论无法与实际结合，属纸上谈兵。只有在对勘中，将翻译语言与目的语言进行逐句对照后，才可清晰地看到译者在翻译中的策略，以及译者的翻译准则与书写规范，如直译、意译、增译、减译、改译等，而这些不同的策略正是作者进行翻译工作的前提与根据，如明清之际译者的“合儒”路线、译名之争、礼仪之争等，从而反映出不同时代《圣经》汉译的背景、环境，在此基础上才可进行透彻、扎实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原真实的汉语《圣经》翻译史。

三 研究文献综述

在以往各类有关汉语《圣经》的论述中，基本已公认三部著作即阳玛诺《圣经直解》、“白徐”《圣经》、贺清泰《古新圣经》为二马《圣经》问世前最重要、最早也是最完整的汉语《圣经》。此三部为汉语《圣经》史上最为重要的译本，可以说从五六年前才开始逐渐进入学界的关注范围。以下将分别梳理这三部著作的研究情况。

1. 阳玛诺《圣经直解》

自唐代传入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广大，《圣经》汉译工作也不断进行。传教士在译介经文的初期，往往是只言片语^①，甚至扭曲原文，以佛经术语进行书写^②，直到《圣经直解》的出现，才有了专门性、系统性、大篇幅对于《圣经》的翻译。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有关《圣经》汉译的著作，是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 1574 - 1659）于1636年写成的《圣经直解》。据统计，《圣经直解》翻译了《新约·四福音书》26.5%的内容。^③

目前有关《圣经直解》的研究尚无专著，国内外相关论文有：李爽学《神话解经学——试剖阳玛诺〈圣经直解〉里的神话型证道故事》（第二届圣经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台湾辅仁大学，2002年1月7日）、《一部由欧洲传教士编纂的索引——评阳玛诺的〈圣经直解杂事之目录〉》（康志杰，《辞书研究》2000年第4期）、日本学者盐山正纯的《由天主教徒摘译的、迪亚斯的〈圣经直解〉》（塩山正純，《カソリックによる聖書抄訳 ディアスの『聖經直解』》，《文明21》第20号，日本愛知大学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会，2008）、王硕丰《〈圣经直解〉初探》（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高胜兵，《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0月）、《文白变迁：从

① 如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中论及灵魂不灭、十诫等教理；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中首见耶稣传等。

② 如景教经文中将“上帝”称为“佛”、“受洗”称为“受戒”、“天使”译为“天上飞仙”等。

③ 王硕丰：《〈圣经直解〉初探》，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圣经直解》到《古新圣经》》(郑海娟,《华文文学》2015年4月)。此外,在钟鸣旦《〈圣经〉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世界汉学》2005年第3期)中,作者用较少篇幅(第72~75页)对《圣经直解》有所介绍。

以上所统计各研究成果中,李奭学《神》^①一文探讨了《圣经直解》中十个神话故事的证道意义,作者列举了《圣经直解》中的十个故事,分别讨论与希腊上古神话的关系,即耶稣会象征论的神话本源论证。康志杰《一》中,首先,作者对《圣经直解》的部分索引内容做了探讨,这是汉语著作中首次出现索引。《圣经直解》的索引分为三部分:周岁主日目录、周岁瞻礼目录、杂事目录。康志杰对第三部分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前两者未提及。其次,作者对《圣经直解》杂事目录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并对阳玛诺的类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说明。在康志杰的论文中,特别谈到了阳玛诺适应中国读者文化心态的编排方式,提出阳玛诺的写作注重中心伦理道德思想融汇的观点。日本学者盐山正纯《由》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圣经直解》大体内容及词汇特色,从《圣经直解》的体裁、翻译、词汇角度入手,着重对《圣经直解》的文言和白话虚词做了研究,并对书中有关《圣经》四福音书的翻译做了数量、篇幅上的统计。此外,作者从《圣经直解》中摘录两句,分别与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对照,指出阳玛诺的翻译基本忠于原文。

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圣经直解〉初探》尽力对《圣经直解》做出详尽的研究,在介绍了《圣经直解》现存各种版本的情况后,对《圣经直解》的结构、内容、序、索引进行了详细介绍。论文将全书经文与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以及思高本《圣经》进行逐句对勘;从翻译角度分析了阳玛诺的合儒策略,并进行个案分析,由增译、改译、缺译等例句的对勘,探寻《圣经直解》的译介方式。此外,笔者汇总出现存阳玛诺之前所有天主教有关《圣经》译介的片段性文字,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 1543-1607)《天主实录》开始共17部,列出191个神学词语(包括地名、人名、神学术语等)在这17部著作中的使用情况,由此梳理出天主教神学词汇在阳玛诺及之前的纵向发展、变化情况,分析《圣经直解》中神学新词语的衍生,勾勒汉语基督词汇的发展脉络。

① 为行文方便,将上文所涉文献做相应简化处理。下同。

高胜兵《无》文中,探讨了《圣经直解》在翻译中的文化取向,作者认为阳玛诺在翻译经文的过程中体现出天主教中心主义的思想,在中西文化汇通时偏执、译词选择时失准、教义比较时排他等特点,并以具体个案说明。郑海娟《文》对早期汉语《圣经》译介时采取的语体进行了探讨,认为阳玛诺特意用古雅的《尚书》“谟诰体”对译,不但将这部典籍提升到与儒家最高经典对等的地位,也为《圣经》自名为“经”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钟鸣旦《1840》书中,用了三页篇幅介绍《圣经直解》的结构、翻译源本、第一卷概述,特别提出书中“箴”部分的依据为巴拉达(S. Barradas, 1543 - 1615)四卷本 *Commentarian Concordiam et Historiam Evangelicam*(1599)。

2. “白徐”《圣经》

在1636年阳玛诺将26.5%的《新约·四福音书》译出后,1707年,由巴黎外方传教士白日昇(Jean Basset, 1662 - 1707)和中国助手徐若翰(? - 1734)翻译的汉语《圣经》问世,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翻译了四福音书的单列本以及合参本两种版本。这是《圣经》汉译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将武加大本《圣经》的《福音全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希伯来书》的其中一章从拉丁文译成文言文,此次汉译规模比阳玛诺更大,翻译的经文内容更多。该书对后来的二马译本有着直接且巨大的影响。

有关“白徐”译本的研究,亦无专著。论文有《白日昇〈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编〉之编辑原则》(曾阳晴,《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2007年12月)、《圣言东来——白日昇与〈圣经〉中文翻译》(周永,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二马圣经译本与白日昇圣经译本关系考辨》(赵晓阳,《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白日昇汉译圣经考》(内田庆市,《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2010年2月第5号)、《从“白、徐译本”到“二马译本”——简论白、徐〈新约〉译本的缘起、流传及影响》(周永,《天主教研究学报》2011年第2期)、《白日昇的中文圣经抄本及其对早期新教中文圣经的影响》(蔡锦图,《圣经文学研究》2011年第5辑)、《汉译新约〈圣经〉“白徐译本”研究》(朱菁,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此外,在徐若梦所著《古代圣经汉译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六章“鸦片战争前的《圣经》汉译本”中,第一节“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编”对“白徐”合参本进行了概括性介绍。

台湾学者曾阳晴《白》文是有关“白徐”译本最早的论文，这篇文章对“白徐”译本福音合参本的编辑原则进行了探究，然彼时尚不知另有四福音书单列本存世，仅推测“白徐”是否会著福音单列本。周永《圣》文中首次谈到了罗马卡萨纳特图书馆（Bibliotheca Casanatense）中“白徐”《圣经》的福音书单列本，考察了“白徐”的两个版本（单列本、合参本）之间的联系及其与二马《圣经》之间的关系，从而初步发掘“白徐”本的文本价值和历史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选取了两处经文，与阳玛诺《圣经直解》、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 - 1649）《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中同处语句进行对照，发现“白徐”译本与阳玛诺、艾儒略译本极为相似；选词几乎一致；另对“白徐”译本中两段经文与和合本、思高本分别比照，分析“白徐”译本翻译特色。赵晓阳《二》专门对二马译本与“白徐”译本之关联进行考察，节选出多处经文及专用名词，得出结论：二马译本很大程度参照了“白徐”译本，另探讨了二马译本之间关系。日本学者内田庆市《白》对“白徐”《圣经》的四个版本（罗马单列本、剑桥合参稿本、大英斯隆合参抄本、香港马礼逊合参抄本）分别进行介绍，并探讨单列本与合参本的关系，认为“白徐”译本在完成了单列本的基础上，写出了合参本。此外，作者将合参本、单列本、马礼逊本、马士曼本中同处经文进行对比，得出先有罗马本、后有合参本的结论，以及马礼逊《圣经》虽参考合参本没错，可应该也看过单列本。周永《从》中通过比较四个版本的异同，追溯其流传过程，简要分析其各自特色，随后通过比较，分析了“白徐”译本的译文特色，探索译名的选择问题，最后分析了“白徐”译本与二马《圣经》的关系。蔡锦图《白》亦对四个版本的“白徐”《圣经》进行了考察，由经文的对勘分析其对二马《圣经》之影响。

朱菁《汉》是目前有关“白徐”译本最为详尽的论文，值得指出的是，作者通过对17~18世纪欧洲拉丁文《圣经》福音合参本与“白徐”译本大英图书馆藏本的详细对照，首次确定白日昇是以1535年巴黎出版的“古利特”（Gouillet）四福音书合参本（*Tetramonon Evangeliorum collectum 8: adunatum*, 8°. Parilis）为底本完成福音合参本的翻译，从而解决了之前学者们关于合参本由来的疑惑。此外，作者经过对“白徐”译本与之前天主教士翻译《圣经》字句或片段的内容比照，梳理了天主教在《圣经》翻译中的历史传承。通过经文的分析，研究“白徐”译本的翻译策略，如忠实原文

的恭敬态度、顺应原则的小心使用、音译意译的谨慎抉择等，尤其是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合儒”方法，与中国传统道德及核心价值的契合、使用汉字本意表达天主新意等。论文对译文中成语的偶用、多用，中国习用的四字句式、被动式，象声词的多次出现以及谐音的使用进行讨论进而分析“白徐”译本的文学性。论文最后详细对比了“白徐”译本之合参本与二马译本的异同，得出二马译本均来源于“白徐”译本的结论，理清了天主教到新教的《圣经》汉译脉络，并量化呈现了各译本之间的术语、名词的演变过程。

3. 贺清泰《古新圣经》

贺清泰 (P. Louis de Poirot, 1735 - 1813)，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803 年其巨著《古新圣经》完成，共三十七卷，近一百五十万字（其中注解部分有三十万余字）。此书翻译了全部《新约》和绝大部分《旧约》，仅余下《雅歌》及部分先知书未译出，可以说是首次汉译了近乎完整的《圣经》。贺清泰本对后来的《圣经》译本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思高本《圣经》的主要译者雷永明神父 (Fr Gabriel Maria Allegra, 1907 - 1976) 是思高圣经协会的创建者，雷永明在翻译《圣经》的准备阶段专程前往北堂，费时月余，以拍照的方式把贺清泰的《圣经》译本复制下来，用作翻译时的参考。^① 目前虽无法证明和合本《圣经》参照《古新圣经》，但根据第一位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记录，他在广州时从一位天主教传教士那里看到过一部汉译白话福音书，据后者说，译者是一位住在北京的耶稣会会士，目前还健在（马礼逊到广州时，贺清泰在北京）。通过马礼逊的记录可推测他看的福音书应该是贺清泰的译本，因此，马礼逊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接触过贺清泰的译本的。

有关《古新圣经》的研究成果有《最初汉语及满洲语〈圣经〉译者——耶稣会士贺清泰》[金东昭、林惠彬，《阿尔泰学报》（韩国）2003 年第 13 期]、*“Four-character Set Phrases: A Study of their Use in the Catholic and Eastern Orthodox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New Testament”* [崛井 (Toshikazu)，《天主教研究学报》2011 年第 2 期，论文中译为《探究天主教与东正教新约圣经译本中成语的使用》]、《贺清泰〈古新圣经〉初探》（郑海娟，

^① 王硕丰：《〈古新圣经〉考》，《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 3 月，第 127 页。